



# 同事兼师长

——怀念滕云先生

宋曙光



新近写的几篇散文,无一例外地都带有职业背景,在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工作时的情况,总会浮现在眼前,涌现在笔端。我记下的这些人或事,都是编辑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,曾经在天津工作过的同事,毕竟是有缘分的,不管相处的时间长短,交集深浅,或多或少都会存有念想,将这些零星片段串联起来,我们的人生经历就有了色彩。

这些天,我在想滕云先生。他于2026年2月1日病逝,享年88岁。他在《天津日报》任职副总编辑期间,我们都是在一起工作,他的突然离世,让我忆起当年相处时的诸多场景,不免心里难过。1977年1月,我调到文艺部时,身边多是年长的老同志,随后便常有编辑调入或调出,这都是正常的工作调动,但如有编委以上的人事变动,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。党报文艺副刊历来是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,先分管的编委、副总编辑相继离休后,听说报社从外单位调进一位副总编辑,主管报纸文艺副刊工作。记得是1992年吧,滕云先生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上,调到《天津日报》任副总编辑,这种情况以前未曾有过,他那时已是研究员职称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出版过多部研究专著,还是《红楼梦》研究学者。以这样的资历升任《天津日报》副总编辑,可见上级主管部门对报纸文艺宣传是何等重视。

新领导上任,总是会有新鲜感。我虽知晓滕云先生大名,但暂未有工作上的联系,赴任副总编辑时,他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,且颇具学者风度,编辑同仁都尊称他为“滕总”。我很愿意延续这种带有亲切感的称呼。那时,报社还在鞍山道社址办公,每次在楼内见到,彼此都会主动打招呼,显得熟络。很快便听说,滕云到任后的第二天,即去拜访了滕云先生,报告自己新的工作调动。滕云表示,没想到上面会派来一位高水平的同志到报社,这是对您的信任,并以“慎言慎行”相嘱。滕云先生给予的勉励,他深深地铭记于心。

调到《天津日报》任职,滕云先生大概是没有想到的,但他早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,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却是响当当的科班出身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,他尚在社科院文研所时,想下工夫研究孙犁的创作成就,便请谢大光先生陪同去拜访孙犁。其时,他刚从湖南、广东等地考察归来,这次见面,谈到萧殷、黄秋耘与孙犁的交往,以及孙犁正准备与《文艺报》记者的谈话,所以,那虽是第一次见面孙犁,但交谈的气氛融洽,时间也大大超过了预期。

如今,他能够来到孙犁先生身边工作,亲聆教诲,真是一种幸运。并且,自己又主管孙犁早年耕耘过的文艺园地,更使他增添了一种使命感,酝酿多年的新的研究方案,终于有了定位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滕云先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这块底蕴深厚的文艺园地上。他知道,孙犁是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的开创者与旗帜。那之后,在每一次向孙犁请教、阅读孙犁作品,包括了解和熟悉那些与孙犁有过交往的作家作品的过程中,他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欣慰,并随之萌生了一桩心愿,也可称之为“奢望”,即在孙犁研究领域创出新绩,这是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赋予他的底气与信心。

这毕竟是一个新的领域,也是一种新的挑战。他每天面对的是作者与作家,看不完的堆积的稿件,编辑与新领导的关系,就是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处熟的。记忆里,滕总没有新官上任时的那几把火,而是认认真真地看稿、看版样。编辑们有事也都会相互沟通,按程序请示、汇报。有了编辑们的支持,滕总的工作进行得流畅自如。在我的印象里,同事之间相互关爱、相处和谐,没有隔阂,大家都尊敬领导。滕总也同样尊重编辑的劳动和创意,从不轻易“枪毙”或撤换稿件。在文艺创作、文艺批评等方面,他是内行,却从未高高在上,颐指气使,以理论家的架势随意指责、批评编辑工作。

平时,滕总是听得多、看得多、说得少,为人低调、务实,他很快便熟悉了报纸编辑业务。在待人、处事及办报上,他都是极其严谨、认真的。1993年6月24日,是《天津日报》孙犁研究小组的一次活动日,特意请来了梁斌先生授课。滕总照例与会,并将梁斌对孙犁散文创作的褒奖,做了极为详尽的记录。在会议现场,他俯身速记下的文字,日后出现在有关孙犁研究的著述中,这种用心且专心的学习态度,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文艺部在四楼的一间扇形办公室办公,楼下就是会议室,部门的主要会议大都在那里进行。以报社年轻编辑记者为骨干的孙犁研究小组,不定期研讨孙犁作品,这也是于1994年成立的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雏形。聚集了南开大学、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多方面研究力量的天津市孙犁研究会,由天津日报社主管,不仅经常举办研讨、出版等活动,每年还会召开展示成果的年会,使天津成为名副其实的孙犁研究中心。滕总作为首任会长,领衔做了大量具

体工作,扩大了研究会在全国的影响力。1998年,孙犁先生85岁,这一年也是他从文学创作65周年,6月27日至28日,由中国作协、河北省作协、河北省文联、天津市作协、天津市孙犁研究会、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“孙犁创作学术研讨会”,在天津日报社社址举行。1995年,天津日报社从鞍山道搬迁至大沽南路873号,办公条件大为改善。市委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话,北京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湖北、安徽等地的作家及研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。这次会议,为孙犁研究勾画出一条独特的风景线,许多研究者的课题都有新视角、新开拓。6月27日的《天津日报·文艺评论》版,特辟“孙犁创作研究专版”,刊发了滕总专为此研讨会撰写的文章《伟大文化守护者》,也是孙犁创作学术研讨会重点论文之一。文章由5月1日曾为孙犁敬寿引出全篇,分列出三个题目:“孙犁文学的二度辉煌与三种成因”“孙犁是伟大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守护者和创造者”“研究学习孙犁,既为传承更为新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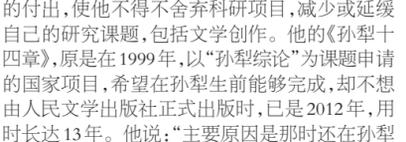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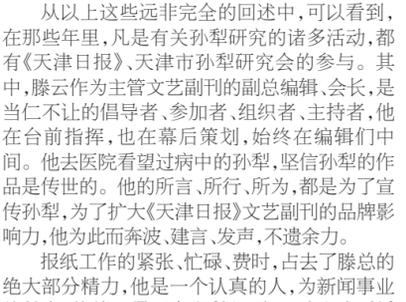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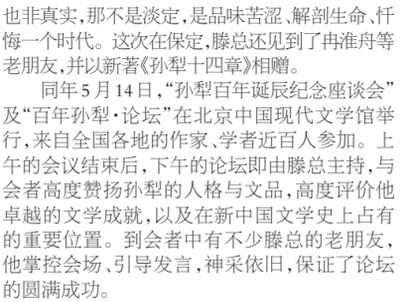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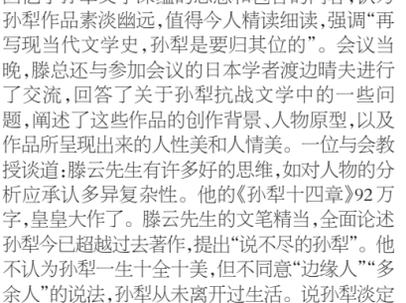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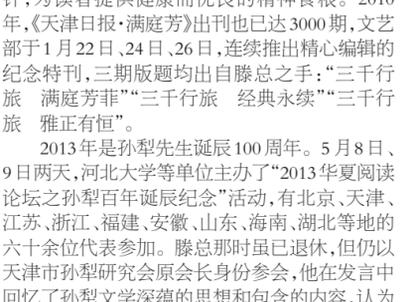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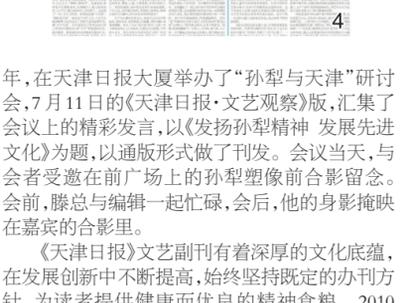
山东画报社在出版孙犁《书衣文集》及“耕堂劫后十种”之后,于1999年11月13日,在北京三联书店召开“回眸:孙犁二十年”出版座谈会,滕云以《天津日报》副总编辑、天津市孙犁研究会会长身份参加并主持会议。他特别谈到对这本书的感想:“这是孙犁同志晚年生命乐章的一首旋律,高高扬扬,扬扬抑抑,抑抑扬扬,最后的首尾集)也没有完全抑,还是扬……孙犁同志现在在医院里,听不到我们的声音,但是我们的的心贴近孙犁。”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从维熙、曾镇南、舒乙、郭志刚等人。

2002年6月下旬,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由滕总带队远赴河北省安新、安平两县,走访孙犁先生故乡。随队人员有研究会成员及天津日报社的编辑记者。一行人先到了同口镇同口小学旧址,几百米之外就是白洋淀。晚上召开了研讨会,由滕总主持,大家多是即兴发言,有教师、学生,也有作家和出版社编辑。第二天中午,他们又赶到孙庄村参观。

2002年7月11日,孙犁先生病逝,文艺部同仁迅速编辑了一块通报,沉痛悼念。滕总更是深情撰联:“山风昔曾吹淀水一片丹霞一派蒹葭挹取清芬怀远者;海雾今已锁砚池一代文宗一簇哲踪留得典型惠后人。”接着又为另一块通报“特刊”拟就版题“遗文垂青史 斯人今远行”。一个月之后,“文艺周刊”出刊2000期,为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,文艺部策划了多种活动,如“旧迹 新台阶——系列作品选登”,就是与滕总反复商议后定下的专栏题,在刊发老作家新作品的同时,配发一篇经缩写后的代表作,这个专栏在“文艺周刊”一直发到年年底。2002年8月8日,是“文艺周刊”出刊2000期的正日子,滕总在连续两期的纪念号上,分别拟出版题“双千行旅 与子相和”“双千行旅 分别勉同心”。他的这些心血吟哦,对仗含韵,情深意远,为版面增添了光彩。

在此活动期间,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《我所理解的报人——孙犁》,提出“孙犁编辑经历久长,编辑思想丰富,编辑经验深厚,编辑见解独到,一般的编辑家、编辑学家,未能臻其境”。他特别摘引了孙犁若干编辑工作的经验谈之后,感悟道:“作为一个晚辈,参与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工作的一个编辑,我把孙犁的这些话,把这些关于办刊原则的话,当作孙犁同志对我们的嘱托,把这些关于编辑操作的话,当作孙犁同志对我们的传经。比起孙犁来,我们差得太远。现在,‘文艺周刊’也出到二千期了,我们应当与时俱进,如果我们还做不到,那么,我们也该以赓续传统为念,竖立我们心中的旗帜。能够成为一张报纸、一张报纸文艺副刊旗帜的现代作家并不多……”这是一位学者至为虔诚的心声。

“文艺周刊”于2002年8月8日另辟专版,刊登为纪念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出刊2000期而召开的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与报纸副刊——“文艺周刊”出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纪要》,编发国内几大报纸、期刊负责人的发言;“文艺观察”版也以整版篇幅,刊载北京和天津的作家、学者在“文艺周刊”出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摘编。就在这次座谈会上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《天津日报》商议,拟设立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。同年10月13日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在武夷山召开年会上,滕总以副会长身份赴会,我陪同前往。滕总代表主办方之一的《天津日报》,向与会者介绍了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及重要意义,使得此一议题全票通过。我当即写了一篇消息,滕总看后电传回报社,转天发表在《天津日报》一版:《津报集团动员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决定 设立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 这是以文学大师孙犁命名的全国报纸副刊编辑最高奖》。这个被报纸副刊界高度认可的奖项的设置,经过多年努力,直到2011年秋天才终于有了结果,滕总功不可没。2003年7月7日,为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一周



工作、生活过几十年的同一张日报的编辑岗位上,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。日常职务行为从隆,挤时间写点与办报业务相关的文章是可以的,从事大型的学术课题研究则绝无可能。”

《孙犁十四章》是倾尽著者全部心智与心血的著作,是从学术立场对孙犁和他的作品所做的综合评述,十四章包括生平考述、作品评析、综合论议等,区别于他人的作家论或是作家评传。在“后记”中,滕总写道:“百读孙犁者有百孙犁,不读孙犁者无孙犁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,孙犁还是会有人读的……今日在史上有其位的作家,其位要下移,或出位了。孙犁呢?是其位下移,还是上移?人们可以等着。等着那天的电视民视,天听民听。”这番话,是在细读、深读、精读孙犁之后产生的熟思,我们深信滕总的预见。去年春天,由再准舟先生提供展品的“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”,在保定光园举办,《孙犁十四章》与其他孙犁研究专著一起,布展在明亮的展柜里。《孙犁十四章》是滕总呕心沥血之作,也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述,他完成了对孙犁先生的“承诺”。

从对孙犁先生的敬重,到对报纸副刊的用心,滕总的付出是充满真情的,大部头的研究搞不了,他就按版面需求、编辑约请写一些报刊文章。他在“文艺评论”版写过津味文学及天津文化的专题文章,也在文艺副刊写过情之所至的散文。他不多的散文写作,水平很高,既有丰富的知识含量,又有相当的文字功力,颇富文采。他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表过的若干篇作品,我都是当作美文来读的,作为责编,每一篇我都要仔细校对原稿,生怕出错。滕总说自己是电脑盲,始终不用电脑敲字,作品都是手写,有的是笔画难辨的繁体字,有的不是字典里能查到的规范词语,我还特别喜欢那些表述新颖的字句,给人以新意和新识。滕总的手稿在我看来字体漂亮,书写规范,属于文人手迹,自存了他的一份手稿,那是一篇写芬兰的访问记。

报社常年有夜班,由编委会成员轮值,滕总夜班下来,上午在家睡觉,下午照例上班,很是辛苦。但他按照报社规定,严格执行,从无怨言。多年下来,已是适应了新闻单位的工作节奏与氛围。报社搬迁至新厦后,我们之间的办公室隔着三层楼,编辑们多在下午去送大样,有的敲门进去,将大样放在桌上,有的不进门,把大样顺门缝塞进去。我喜欢有事先打电话,送大样都是敲门进屋,滕总桌子上摊开的是报纸版样,几乎没见过与报纸无关的研究书籍。他是严谨的,不在工作时间进行自己的科研课题。放下大样,我总爱聊上几句,文艺界的话题很多,他却很少发表意见,有很深的修养与涵养。他从不开吹捧人,也不轻易表扬谁,他心里有一个高标准。有时候我们正说着话,碰巧会听到办公室门口的一声,一份大样塞了进来。在签付印的时间,滕总都是等候在办公室,极少遇到突然有事或在外开会等情况,让编辑久等。

工作之外,同事之间,是可以深入交流的,能聊得来可以融洽关系,便于工作。滕总与青年编辑、老编辑都很谈得来。那些年,偶有部门聚会,他都以老同志为尊,从不摆领导架子,谈笑随意自如,新闻单位的等级观念不明显,领导与编辑、记者间交流顺畅,似是有传统的。他的老伴儿单老师,曾是一位中学教员,儿子学医,女儿在国外,一双儿女都很优秀。我见过单老师几回,人特别温和、豁达。她退休后,上老年大学学习绘画,在“满庭芳”版上,我们还曾选发过单老师一幅牡丹花的习作。滕总尤喜绿植,擅养花卉,记得报社一位球友友人管理过一处花窖,我曾介绍滕总前去观赏。

我们曾有过两次一起出行,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去武夷山开会,另一次则是接受老作家杨朔身邀,到他挂职的平山县老家采风。滕总与老杨关系交好,老杨是一位非常质朴的乡土作家,与滕总谈得来,感情上有深交,滕总调到报社后,他们依然保持交往,友谊比之前更深了。滕总调到报社后,对老作家们非常尊重,这从他对副刊版面作家稿子的处理上,就能看得出来,从不夹带私人印象和好恶。

有一年春节假期,我们去看望滕总,他的家搬到远离市区的一座安静之所,多年未见,记忆里那位办公高楼里的滕总,如今成为平宅里的老者,却不减一身的儒雅。那时,他身体已经患病,退休后做过心脏手术,仍在潜心研究“三国”,拿出一篇长文给我们看。我当时建议在副刊版上开设一个专栏,将这些难得的好文章发出去。

他在文联工作期间,曾任《文学自由谈》创刊时的双任主编。2025年底,这本刊物拟举办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,想约请他出席会议或发言,不想,他的身体已出现不适,未能留下任何宝贵资料,实在遗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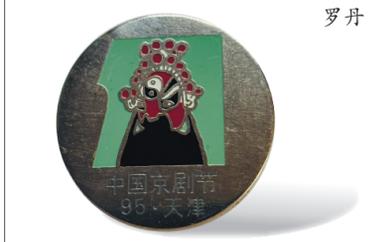
滕总病逝后,《天津日报》退休微信群里,有人及时发出了讣告,大家不分编辑部、工厂、后勤,纷纷表达哀悼之情,可见滕总在老同志们的心中,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社科院文研所的老同志前不久跟我说,滕总会请他到《天津日报》后,很多年的春节,所里都会请他去聚会,畅叙友情。

这些天,我不断翻看滕总为“我与孙犁”丛书所写的书评手稿,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孙犁先生的至深情感,再次让我泪目。2022年7月,为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,我约请再准舟、谢大光、肖复兴、卫建民四位曾与孙犁有过深入交往,同时也是文艺副刊的老作者,共同出版了一套总计五册的“我与孙犁”纪念丛书。滕总收到样书后,约写了一篇评论文章《平生风义兼师友——纪念丛书“我与孙犁”读后感》,发表于2022年12月29日“文艺周刊”版。他从“事”“理”“情”三方面,写了对五本书的感想。这之前,我只知他是抱病阅读书籍,却不知此时又染新疾。他的散文《马头勘漫思》,2024年6月27日发表在“文艺周刊”版,表达了他对家乡绵绵不尽的赤子之情,成为留世的最最后一篇作品。滕总在《天津日报》工作了12年,退休时已是66岁。这既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全部时间,也是他整个人生履历中,极具光彩的一段光阴。报纸文艺副刊的百花园中,会留下每一位扶植者的脚印,岁月将记住他们的名字,并向“扶犁执耨,播种耕耘”的园丁精神致敬!

滕总在《天津日报》工作了12年,退休时已是66岁。这既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全部时间,也是他整个人生履历中,极具光彩的一段光阴。报纸文艺副刊的百花园中,会留下每一位扶植者的脚印,岁月将记住他们的名字,并向“扶犁执耨,播种耕耘”的园丁精神致敬!

“粉墨辨忠奸,曼舞轻歌皆世态;笙琶弹喜怒,繁弦急管尽人情。”走进古朴典雅的天津广东会馆(天津戏剧博物馆)戏楼,便可看到这副著名的楹联,它生动地反映了戏曲舞台通过精湛演艺展现世态人情的社会意义。天津文化类徽章品种丰富,其中演艺题材纪念章尤为引人注目。改革开放以来,天津多次主办或承办在全国有影响的多种形式的艺术节,发行过很多相关主题、精致而有创意的纪念章,值得收藏与欣赏。京剧题材纪念章在设计上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,即可充分利用京剧脸谱作为主要图案。京剧脸谱是净、丑等行当专用的程式化面部化妆艺术,以色彩、线条和构图高度凝练地表现出人物性格和身份。本文开头所述天津广东会馆戏楼楹联中的“粉墨辨忠奸”,便与京剧脸谱的特殊功能相关。由于脸谱的视觉辨识度很高,遂成为京剧艺术及其衍生品的一个重要标志。我集存的1992年天津发行的全国青年京剧展演纪念章,1994年天津发行的全国第二届“新苗奖”少儿京剧邀请赛纪念章,以及天津市电力公司第三届职工文化艺术

##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(十六) 繁弦急管尽人情



艺术节专场纪念章等,都是选择以京剧脸谱为基础图案设计而成的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天津首饰厂制作过多种京剧脸谱的金属徽章,颇受京剧爱好者青睐。1995年11月,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天津举办。为此发行的“中国京剧节·95·天津”纪念章,采用不锈钢材质制作,呈现出境面银白色调,视觉上干净利落,理性沉稳。章面中部设计出一块略显敦厚的“1”字形状的绿色作为底色,衬托出一个黑、红、银白色调相间的适度变形的组合式脸谱,颇显新意,反映出京剧艺术的丰富多彩和变化无穷。

天津青年艺术节纪念章也是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徽章。1986年10月,共青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天津青年艺术节,安排了音乐、戏剧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、集邮、服装设计、家庭室内陈设艺术等各类演出和展览共36项活动。首届天津青年艺术节发行的圆形金属纪念章,以绿色为底色,中心图案是一朵白色的花,左右对称的两片叶子呈打开的书页状,显得十分舒展,象征艺术节旨在全面活跃青年业余文化生活,为更多的青年创造“表现自己,施展才华”的机会。1988年10月,第二届天津青年艺术节举办,主要内容是通过比赛评选各项“十佳”,包括“十佳”歌星、笑星、舞星等。第二届天津青年艺术节发行的金属纪念章,近似水滴状,以深蓝色为底色,中心图案是一个“Y”字母,代表“艺”字,银白色双行,略有卷尾,仿若流淌出一段青春的旋律,彰显出当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。

天津演艺题材纪念章充分发挥了徽章记录时代的通用功能。看到它们,便使人回想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举办的多项重要的群众性文艺活动。例如1986年举办的天津“希望杯”歌手大奖赛,历时三个月,报名参赛者达七千多人,有36名优秀歌手进入决赛阶段的角逐,由观众直接投票产生名次,共收到有效选票三十六万多张,市民参与度很高。天津三五二二厂承制的“希望杯”歌手大奖赛纪念章,设计为扁圆形,呈黄白色,主图上方为一朵红花,下方为左右对称的两只白羽稚鸟,张着大嘴,象征着崭露头角的青年业余歌手在放声歌唱,凸显了“希望杯”歌手大奖赛的社会意义。

再如1989年举办的首届“南开杯”全国业余话剧小品邀请赛,从千余个小品中遴选出精品,《游击队》《大米与红高粱》等作品均出自该赛,后来登上央视春晚舞台,在全国家喻户晓。“南开杯”全国业余话剧小品邀请赛正菱形纪念章,以三个不同颜色的“口”字组合成一个“品”字,将小品概念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艺术标志。

题为1995年发行的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纪念章。

